

绪 论

绪 论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远离中原地区。其东南是茫茫太平洋，西北横亘着武夷山脉，西南有博平岭山脉，东北是太姥山脉。大海和高山峻岭严重阻隔了福建与外界的联系，使福建在史前至秦汉这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与外临相对隔绝的状态。秦汉以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闽越土著及其先民的文明发展进程也因而落后于中原地区。秦汉以后福建土著闽越族在北方中原王朝的统一进程逐步推进之下，在中原先进文化和汉晋以来汉人移民浪潮的冲击之下，逐步融合于汉文化传统之中。土著闽越人的文化底层以及北方汉人移民文化的融合，造就了福建汉民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特殊性，成为中华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重要一环。福建的民间信仰也由此具有迥异于中原地区的特色，而这其中的动物神信仰就是特色之一。

福建民间信仰源远流长，至迟在新石器时代就产生了原始宗教。此后，福建民间信仰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好巫尚鬼”的传统，不但神灵众多，宫庙林立，而且深刻影响着福建人的日常生活。因而，福建的民间信仰一直为学界所关注。这其中学者们用力最勤的研究对象集中于妈祖、临水夫人、保生大帝、三平祖师、清水祖师等佛教、道教俗神。相较而言，对于福建民间的动物神崇拜则研究不多。

福建的动物神崇拜之研究，早可追溯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国立中山大学的《民俗》学刊上，叶国庆、叶竹君等多位学者发表了有关闽南地区包括动物崇拜在内的民间信仰的文章。但这些文章都未对动物崇拜做深入探讨，多是一些动物崇拜情况的介绍。四十年代，凌纯声先生对畬族的盘瓠崇拜，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①四、五十年代，徐天胎先生在他的专著《福建神道迷信》（油印本）中，也有专章论述动物崇拜。建国后，不少学者在论文专著中论及动物崇拜，但多只涉及个别动物，如郭志超的《闽台崇蛇习俗的历史考察》，^②动

① 凌纯声：《畬民图腾文化的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

② 郭志超：《闽台崇蛇习俗的历史考察》，《民俗研究》，1995年第4期。

物崇拜的经典个案是南平樟湖坂的崇蛇习俗，对此学者们研究较多。^①此外汪毅夫的《客家民间信仰》中论及了客家的动物神信仰，^②杨琮的《闽越国文化》一书，谈到了福建闽越国时期蛇、鸟等图腾崇拜。^③目前为止，就福建动物崇拜比较全面的研究成果，是九十年代福建学者的两部专著，《福建民间信仰源流》^④和《福建民间信仰》，^⑤两本书中都有专门的章节讨论动物神崇拜。其他研究成果散见于各论文之中。

以上这些有关福建动物崇拜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蛇、蛙、狗、猴、龟等几种动物。在资料的来源上，主要是取自一些历史文献。而就福建历史上的民族变迁，尤其是汉唐以来闽越文化与汉文化主从地位的变换，对福建史前就存在的动物崇拜的影响，做系统论述的文章少见。因此，本文将尽可能地全面收集福建动物崇拜的材料，不仅是历史文献，还包括考古材料、民族志、民间故事等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就福建历史上民族变迁与动物崇拜的关系进行研究。

本文将福建动物崇拜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福建土著闽越族及其先民（已消亡的古民族）动物崇拜的余绪，二是汉唐以来福建汉民创造及继承中原文化的动物神崇拜。其中第一类又可分为闽越族的图腾崇拜（蛇、狗、蛙）和闽越族的其他动物神崇拜。第二类崇拜有猴、虎、狐以及其他一些动物神。同时本文将福建人分为汉人、畬族、蛋民三个族群。

本文前两章主要梳理史前至明清时期，福建地区出现过的动物崇拜；后两章讨论了汉唐以来福建的民族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对福建不同族群的民间动物神崇拜的影响。

① 林蔚文：《福建南平樟湖坂崇蛇民俗的再考察》，《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② 汪毅夫：《客家民间信仰》，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③ 杨琮：《闽越国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④ 徐晓望：《福建民间信仰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

⑤ 林国平、彭文字：《福建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第一章 史前至西汉前期福建动物神崇拜的考古学观察

第一节 史前至先秦时期福建动物神崇拜之迹象

根据考古资料的发现，距今约三、四万年前（晚更新世晚期），人类就开始在福建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①从那时起，福建所处东南地区的远古人类就创造了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地域特色浓厚的旧石器文化（以砾石石器工业为核心），即便在旧石器晚期受到了来自北方地区的旧石器工业的影响，也没能打破其传统。^②在这一传统基础上，包括福建在内的东南土著民族创造了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以几何印纹陶文化为典型代表的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物质、精神文化。

从中原华夏文化的视野看，史籍中福建所在的东南地区最早的民族是传说时代至夏代的“三苗”。《淮南子·坠形训》载：“自西南至东南方结胸民、羽民、罐头国民、裸国民、三苗民……”^③但这时福建的土著民族还未进入华夏人文的视野。

商周以来，随着中原华夏政治与文化向周边地区，包括东南地区的逐步扩展，华夏民族对周边人文的认识逐步加强，并不同程度地予以记述，东南土著的历史也开始零星地出现于《尚书》、《周礼》的一些段落中。在这些汉文史籍中“新增”了“十蛮”、“越沔”、“七闽”、“八蛮”等东南民族成分。其中的“闽”、“七闽”应主要指分布于福建一带的周代土著。《周礼·职方氏》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国，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④《周礼·象胥》载：“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⑤

战国时期，“闽越”作为百越的一支，开始出现在汉文史籍中。《吕氏春秋》

① 尤玉柱等：《福建清流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人类学学报》，1989年第3期。

② 吴春明：《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41页。

③ 《淮南子》卷四。

④ 《周礼》卷三十三，《夏官·职方氏》。

⑤ 《周礼》卷三十八，《秋官·象胥》。

曰：“扬、汉之南，百越之际”；^①《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及至秦王……南取百越之地”；^②《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将闽越、东瓯描述为越王句践的子民，“（公元前334年）楚威王兴兵而伐越，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③《史记·东越列传》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④据此，闽越是周汉间福建、浙南的百越支系，秦汉时甚至建立了割据王国，与南越国等一起雄踞东南并与汉中央王朝相对峙。

除了这些站在“异文化”角度上的“民族志”式的汉文史籍，这一时期的东南土著实际上还是缺乏本民族自身文献历史的“史前”民族。因而仅仅凭借华夏文人笔下表达出来的对闽越故地人群的这些模糊观察是很难全面、清晰地诠释上古闽中社会文化历史的，还应该从先秦福建的考古学文化形态的变迁来说明。因而，追寻福建先秦以前土著人群动物崇拜的线索，也应主要依靠考古学的材料。

福建的动物神崇拜从商代开始就有迹可寻。商周时期，是福建土著“七闽”向“闽”与“越”融合而成的“闽越”的过渡时期。^⑤崇安武夷山白岩洞的商代崖墓葬（在福建本身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则处于新石器晚期），其主人是闽越族的先民，墓葬中随葬品仅见龟形木盘，^⑥可见龟在商周闽越先民中的地位崇高，应该是对龟的一种崇拜。

闽越先民的这种龟崇拜也有可能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从传说时代开始，黄帝族、鲧氏族及东夷的一些氏族，都曾以龟为图腾，甚至以其形象作为

① 《吕氏春秋》卷二十，《恃君览·恃君》。

② 《史记》卷六。

③ 《史记》卷四十一。

④ 《史记》卷一一四。

⑤ 吴春明：《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231页。

⑥ 福建省博物馆，崇安文化馆：《福建崇安武夷山的白岩洞墓清理简报》，《文物》1980年第6期。

族徽。中华民族始祖黄帝“轩辕氏，亦即天鼋”鼋即大龟，^①这说明黄帝是龟的传人。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仰韶文化时期（公元前 5000 年—3000 年）中原地区就出现了龟形象的实物，如陕西武功遗址所出龟形陶壶。^②在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马家浜文化中，龟器随葬现象屡见不鲜。^③到商代青铜器上常可见到龟纹。^④而从考古资料看，武夷山地区在周代以前，较之闽江下游地区有更多的境外文化因素的介入，^⑤因此，白岩洞墓中的龟盘也有可能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在商末至西周时期，福建地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化首推“黄土仑类型”。典型代表是闽侯县黄土仑遗址墓群，在 19 座墓葬中，出土了 140 多件随葬陶器，造型优美，装饰典雅且风格独特。其中一些器物的肩、腹、膝、耳部有捏塑的羊、虎、夔龙等动物形象的装饰，此外还出土了禽形壶，造型即为禽鸟之形象。经对黄土仑印纹陶文化层中采集的木炭标本进行碳十四测定，结果为公元前 1300 年±150 年，相当于商代晚期。^⑥黄土仑遗址的原始先民在随葬陶器上装饰动物纹样，或以动物为题材雕刻或雕塑成器，不仅起到了美化器物的作用，还可以用来辟邪，并且很有可能这些动物是原始先民的图腾，或是受到原始先民特别崇拜的动物。西方学者凯利（Kelly）曾对动物形艺术品进行研究，指出：“在史前社会里，动物不仅仅扮演了经济的角色，还扮演了象征和宗教仪式的角色”。^⑦原始先民对动物有着敬畏和神秘的心理，甚至把某种动物作为人的保护神去崇拜，这种现象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出现，比如流行用动物的牙齿穿孔做成人体的佩戴具，以祈求狩猎成功、辟邪、防病等。^⑧

福建从新石器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与其他东南地区一致，同属于几何印纹陶文化。几何印纹陶文化的得名，主要是源于这一文化出土的陶器上拍印的

① 刘兆元：《中国龟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年，18 页。

② 吴山编著：《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图 10，文物出版社，1982 年。

③ 高广仁、邵望平：《中国史前时代的龟灵与犬牲》，《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一），文物出版社，1986 年。

④ 倪润安：《论两汉四灵的源流》，《中原文物》，1999 年第 1 期。

⑤ 吴春明：《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年，69 页。

⑥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闽侯黄土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 4 期。

⑦ 转引自安家瑶：《我国史前的动物形艺术品》，《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 年第 2 期。

⑧ 安家瑶：《旧石器时代晚期佩带具的功能及含义》，《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 年第 2 期。

几何形纹饰。有的研究者,对陶器上拍印的各种几何形花纹,经过分析研究后,认为“是蛇状和蛇的斑纹的模拟和演变。”如“所谓云雷纹,可能就是蛇的盘曲形状的简化”;S形纹,“可能是蛇身扭曲的简化”;“回纹是从菱形演变而来的,它们都是蛇身上花纹的图案化,可能是从五步蛇身上的花纹演变来的。”;

“波状纹更可能是蛇爬行状态的简化”;曲折纹“这种纹饰也是蛇身花纹的简化,我们可以直接在蛇纹中找到它的祖形”;叶脉纹“是蛇身上的花纹或者是蛇脊骨的模拟”;三角形纹的“来源应是五步蛇的斑纹”;编织纹“在蛇皮身上虽找不到完全相同的图案,但它仍和蛇花纹有关,可能是从上述的三角纹演变而成的”;菟点纹“很容易在蛇身上找到原型”;圈点纹“可能是蛇眼睛的简化”;方格纹“可能是前述的菱形、回纹的简化,也有可能是蛇皮鳞纹的模拟及简化。”古越人在日常使用的陶器上,饰以同蛇花纹或蛇形状有关的几何形纹样,“其原因是由于陶器主人对蛇图腾的崇拜。”^①世界上其他“图腾民族于武器、用具等的图腾描写,多象征化而简缩为花纹。写实形、几何形、简省形三种均使用。”^②越人的陶器纹饰,应属“简省形”和“几何形”之类。

对东南地区的几何印纹图纹样的起源作这样的阐释,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如果从民族学的角度看还是颇有根据的。高山族文身花纹和各种器物上雕画的各种几何形纹样,据研究与蛇的形状、花纹有密切关系。^③台湾高山族的先民系南岛语族,而中国东南沿海又是南岛语族的发源地,台湾的土著先民亦来自包括福建在内的东南沿海地区。对当今台湾高山族陶器几何形纹样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数千年前福建土著的动物信仰应有所裨益。

除了陶器上的纹饰,在漳州地区的上古岩画中也有不少福建原始先民动物崇拜的证据。漳州几乎所有的辖县都发现有岩画,就已发现并经过调查的岩画统计,已有19处,36幅,成为我国东南地区岩画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这其中有不少和这一地区原始先民的动物神崇拜有关。如其中最为出名的华安仙字潭岩画,有一些蜷曲的线条,一些学者认为这些线条是蛇的形象,^④另一些则认为

① 陈文华:《几何印纹陶与古越族的蛇图腾崇拜——试论几何印纹陶纹饰的起源》,《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② 岑家梧:《图腾艺术史》,学林出版社,1986年,61页。

③ 何廷瑶:《台湾土著诸族文身习俗之研究》,《古人类学刊》第15、16合刊。

④ 李洪甫:《论中国东南地区的岩画》,《东南文化》,1994年第4期。

是弯曲的小路。^①其画面中还有兽面纹,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人面像。此外还有难以辨清的动物形象。华安石门坑岩画,主题是十多个蹄印的刻划和羊以及圆穴。是该地区原始先民动物崇拜的反映,是对牲畜繁衍丰收的一种祈求。有关蹄印的岩画在漳州地区被发现很多,如南靖县的村雅村岩画。华安官畲岩画,内容为7个与动物有关的符号。华安草仔岩画,刻面上较为显著的一幅是两条蛇交叉的图案,其左侧有一圆圈,可能是标示蛇卵,另有一体形较小似为幼蛇。以两蛇相交、首尾相随或缠绕在一起的图画是草仔山岩画的主体。蛇形画所反映出的图腾崇拜意识是很清楚的。华安新圩乡的蕉林岩画也以蛇图案为主题。华安良村岩画,岩画画面散布着圆穴、足印以及类似鸟头形的刻划,尤值得重视。漳浦大苗山岩画,在多幅画面中,有一幅以一蛇形线刻划为主题。蛇身呈四处弯曲。诏安溪口岩画,画面的主题是两条蛇形曲线,其间(主要是蛇形线下方)散布一些圆穴,应为蛇卵的标示。^②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方、西北、西南等草原民族地带岩画中所占比重甚大的牛、羊等动物的崇拜图像,在东南岩画中却极其少见。

第二节 闽越国时期福建的动物神崇拜

闽越王无诸等闽越王族贵胄在战国末期就称王、称君于闽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将他们废为君长,在闽越族的聚居地设立了闽中郡。秦末农民大起义,闽越王无诸等率闽中子弟兵与百越起义军追随刘邦军队。之后无诸等闽越王族又率闽中兵佐汉击楚,为汉王朝的建立做出了贡献。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封无诸为闽越王,在闽中故地立国。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闽越国除,置冶县。闽越国存世约百余年。闽越族虽曾一度称王立国,但闽越族缺乏本民族自身的文献历史。其间虽有秦废闽越王、立闽中郡,汉除闽越国、置冶县等措施,但中原王朝对福建的统治一直是间接和局部的。因此,汉文史籍对福建先秦两汉历史的零星记载也往往存在不正确不全面之处。对福建这段民族史的全面认识,也主要应以考古出土资料为主。

① 欧潭生、卢美松:《福建华安仙字潭岩画新考》,《考古》,1994年第2期。

② 李洪甫:《论中国东南地区的岩画》,《东南文化》,1994年第4期。

闽越国时代，闽越族的文化更多地受到了中原内地先进文化的影响，闽越国时代的文化是既继承了先秦时期闽越文化，又有所汉化的闽越族物质文化。从以城村故城为代表的闽越国日用陶器来看，闽越国时代的闽越艺术匠师们，不仅精擅于平面上的美术创作，也具备了相当的立体塑形技艺。目前出土的雕塑品实物，以陶器上的动物造型为主。如陶提梁盃上的龙，陶熏炉盖、匏壶盖上的立鸟，陶甗耳系上的青蛙，陶提桶上的蛙首，陶洗上的兽面铺首等。这都反映出闽越国人对鸟、蛙的喜爱和崇敬之情。以下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以动物纹饰或雕塑为装饰的器物。

闽越国时期的熏炉，也称香熏。装饰纹样和造型不尽相同。一般来说：炉盖均为三角形镂孔，盖钮多见鸟形。在闽侯庄边山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闽越熏炉，系大小三个套连为一器的造型，十分精美别致，其盖钮亦为鸟形。庄边山其他墓地中有其他器物的盖钮亦为鸟形。^①

1985年在崇安城村北岗遗址出土的闽越国青铜铎1件，其表面呈青灰色，断面呈深灰色，筯残缺，舞面为蟠虺纹，残存两对相互缠绕的虺蛇。体侧上部饰云雷纹，勾连云雷纹及三角形的变体蛙头纹等组合纹饰。此铎为典型的战国青铜器。^②铜铎在古代多用于原始宗教祭祀等活动，其上刻划的蛇形、蛙形图案应与闽越人的信仰有关。

在崇安汉城内高胡坪甲组建筑遗址中出土青铜钟1件。仅残存铉部。其残存部分的花纹为鸟形纹。它不仅具有战国遗风，而且也有一定的地方特色。^③

除了器物之外，闽越国时期出土的瓦当上也有鸟纹和蛙纹。秦汉瓦当的装饰图案丰富多彩，或绘生动的动、植物图画，或印抽象的云纹图案，或以象征吉祥的语言文字（也有以宫殿署名）为装饰。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装饰建筑物，起到高贵、壮丽和威严的艺术效果。秦汉时期的瓦当一般用于教大的宫殿阁宇或重要的官署、住宅之上，使之显得堂皇壮观。社会下层的居民和一般建筑是难以拥有此物的。因此瓦当上出现蛇纹、鸟纹等纹饰，说明闽越国人对蛇、鸟等动物的崇敬之情。福建闽越国瓦当目前仅发现于武夷山城村故城和福州屏山

① 林公务：《福建闽侯庄边山的古墓群》，《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

② 杨琮：《闽越国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273页。

③ 杨琮：《闽越国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274页。

宫殿建筑遗址中。

在崇安汉城的几类瓦当中，有一类瓦当，以云树纹为主辅以其他纹样的图案。这类瓦当图案均以树尖向上，图形以卷云表现上天，树木立于地表示地上，用以反映天地合一的现象。这类图案又有许多局部纹样上的变化，是闽越国瓦当中最富地方特色的一类。^①其中以云树纹配以蛇、鸟纹图案最具鲜明艺术个性。如图案中的一只展翅飞鸟和两条相绕的蛇虫形象，简练生动。应是闽越国对蛇的重视以及蛇图腾崇拜的一例旁证。

此外，福州城区北部屏山（又称越王山）遗址现已暴露或揭示的地点中，省建设银行地点发现有少数绳纹瓦内侧的乳钉纹上压印了被发掘者称为“蛇头纹”的符号。在屏山农贸市场地点也发现了“蛇头”图案戳印的板瓦残片。^②

以上这些考古材料，正可与文献中有关闽越及其先民的动物崇拜相印证。闽越族是周代以来因吴、越人群的南迁并与土著闽文化融合的产物，闽越人的文化也必融合了二者的因素。文献中有关闽越及其先民的动物崇拜的材料主要来自吴、越两国。

就蛇崇拜而言：《国语》载，子胥劝吴王夫差，不可放越王句践回国时说：“夫越王好信以爱民，四方归之，年谷时熟，日长炎炎，及吾犹可以战也。为虺弗摧，为蛇将若何……。”^③《吴越春秋》在记述吴国大城的结构和装饰时说：“子胥乃使……，造筑大城，……立蛇门者，以象地户也。阖闾……欲东并大越，越在东南，故立蛇门以制敌国。……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门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属于吴也。”^④这些史料上的记载，都是把越国的标记视为蛇的证明。在《山海经·海内南经》中，也有南方地区之神，人首蛇身的记载。

在鸟崇拜方面：越族流行鸟田传说。《越绝书》载：“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⑤《吴越春秋》又载：“尧崩……天下悉属禹也，……凤凰栖于树，鸾鸟

① 杨琮：《崇安汉城出土瓦当的研究》，《文物》，1992年第8期。

② 吴春明、林果：《闽越国都城考古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188—190页。

③ 《国语》卷十九，《吴语》。

④ （汉）赵煜：《吴越春秋》卷二，《阖闾内传》。

⑤ （汉）袁康、吴平：《越绝书》卷八，《外传记地传》。

巢于侧，麒麟步于庭，百鸟佃于泽。”^①越人有“鸟相”、“鸟语”的传说。《吴越春秋》中就记载范蠡有“夫越王为人长颈鸟喙”之语。^②另晋人张华《博物志》说：“越地深山有鸟如鸠，青色，名曰冶鸟。……越人谓此鸟为越祝之祖。”^③《吴越备史》又云：“有罗平鸟，主越人祸福，敬则福，慢则祸。于是民间悉图其形以祷之。”^④

蛙崇拜亦是如此：《韩非子》：“越王勾践见怒蛙而式之。御者曰：‘何为式？’王曰：‘蛙有气如此，可无为式乎？’士人闻之曰：‘蛙有气，王犹为式；况士人之有勇者乎？’是岁，人有自刭死以其头献者。”^⑤“式”通“轼”，古人乘车在道上相逢，凭轼敬礼，称作“轼”，越王勾践乘车时遇到怒蛙而行礼，是为了表明他尊重有勇气的人，但这也表明越人对蛙有一种奇特的敬意。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其他文献，《吴越春秋》载：“勾践恐军士畏法不使，自谓未能得士之死力，道见蛙张腹而怒，将有战争之气，即为之轼。其士卒有问于王曰：‘君何为敬蛙虫而为之轼？’勾践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称吾意者。今蛙虫无知之物，见敌而有怒气，故为之轼。’于是，军士闻之，莫不怀心乐死，人致其命。”^⑥越人敬蛙，这与越人文化传统有关，越人以蛙为图腾，认为蛙的种种表现都是有涵义的，因此，“怒蛙”可以激励士气。

综上所述，商周以来，福建的土著闽越族及其原始先民就开始有了蛇、蛙、鸟等动物图腾崇拜。

①（汉）赵煜：《吴越春秋》卷四，《越王无余外传》。

②（汉）赵煜：《吴越春秋》卷六，《勾践伐吴外传》。

③（晋）张华：《博物志》卷三，《异鸟》。

④（宋）钱俨：《吴越备史》卷一，《武肃王上》。

⑤《韩非子》卷九，《内储说上·倒言七右经》。

⑥（汉）赵煜：《吴越春秋》卷六，《勾践伐吴外传》。

第二章 西汉后期至明清时期福建的动物神灵崇拜

第一节 西汉后期至六朝时代福建的动物神灵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汉武帝派兵入闽，灭亡了闽越国，并模仿秦代迁徙六国豪强于咸阳的策略，将闽越族的官僚、贵族和军队及部分百姓强制迁徙到江淮间，以绝闽中后患。《史记》载：汉武帝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①其实，所谓汉武帝“将其民徙处江淮间”，只能是闽越国的上层统治人物以及部分军队而已。而大量的闽越族土著，纷纷遁逃山谷间，繁衍了下来，在很长的时期内仍保留着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原生民族文化。西汉后期，中央政府在福建设置冶县以为管理，福建与中原的交往有所加强。闽越族在北方中原王朝统一进程逐步推进之下，在中原先进文化和汉晋以来汉人移民的冲击之下，逐步融合于汉文化传统之中。

东汉之后的六朝时期是福建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闽中地区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开发热潮，人文繁荣、郡县增置。福建发现的一百多座六朝时期墓葬，从形制、结构、墓砖纹饰、随葬品的组合及其发展变化，都与闽中以外的汉族地区同期墓葬的文化内涵一致。充分说明了汉文化此时已经成为闽越故地民族文化的主体。汉族的宗教文化也随之传入福建，汉式的动物崇拜内容也同时被吸纳。此时福建民间的动物崇拜主要体现于墓葬当中。

闽越族的动物崇拜虽然也被此时的福建汉人所继承，但因汉文化已成为闽中故地的主体，闽越族的动物崇拜已难以在墓葬中得到体现。古人“事死如事生”，此时的福建汉人不管其来源是正统的中原汉人，还是汉化的闽越人及其后裔，由于其身份的汉人认同，已不可能在墓葬中体现闽越族的动物崇拜。出现在汉人墓葬中的，只可能是受中原影响的动物崇拜。

在福建所吸纳的中原北方的动物崇拜中最富代表性的是“四灵”崇拜。“四

^① 《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

灵”亦称“四象”、“四维”、“四宫”、“四兽”等，是对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统称。《三辅黄图》曰：“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①

考古发现中，最早的完备四灵形象，出现在西安国棉五厂汉墓 M6 中出土的一件铜温酒炉上。该炉四面镂刻四灵纹，时代是“西汉早期，下限时间也只能到武帝前期”。^②比此稍晚，汉茂陵^③及其陪葬冢附近就出现四灵俱全的画像空心砖。^④

福建地区六朝墓葬，已发现一百余座，墓葬的分布以闽北、闽南和福州一带较为集中。在福建发现的六朝砖室墓，都是用各种规格不同的花纹砖券筑的。在这些墓砖的花纹中就包括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形象，以及鱼纹、飞鹤、兽面、鸟纹等动物形象。如闽侯南屿的一座南朝墓，是迄今为止福建发现的纹饰最多的一座典型的花纹砖室墓。^⑤这座墓的风格，与南京油坊桥发现的一座南朝画像砖墓的花纹装饰极为相似，其内容除青龙、白虎、飞鹤、飞鱼等外，均以反映佛教题材为主。福建的四灵信仰，明显是受到了中原的影响。

第二节 唐宋时期的宗教与动物神灵

唐代以前，福建汉人的定居点以及开发的区域，还只局限于一些自然环境比较优越的地方。唐宋时期福建的开发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福建全境全面开发的格局已经形成。先是唐前期陈元光进漳，平定、招抚蛮獠，开发九龙江流域。后唐末五代王审知入闽，建立闽国。闽国作为五代十国时期一个独立割据的政权，政治、文化上全面移植了中原北方的系统。在宗教信仰方面尤其如此，王氏父子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特别崇信和倚重佛教。王氏政权不仅礼遇高僧，还拨出大量经费建造寺院，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禅宗大盛于福建。到了宋代，佛教在福建依然兴盛，福建僧侣人数之多亦居全国之冠。^⑥道教虽不如佛教兴盛，但与唐以前相比，数量仍是成倍甚至几倍地增长，许多道教流派都在福建流行。

① 《三辅黄图》卷三，《长乐未央建章北宫甘泉宫中宫室臺殿》。

② 呼林贵、孙铁山、李恭：《西安东郊国棉五厂汉墓发掘简报》，《文博》1991年第4期。

③ 汉武帝刘彻的陵墓。在今陕西省兴平县策村之南。为西汉诸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葬于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

④ 王志杰、朱捷元：《汉茂陵及其陪葬冢附近新发现的重要文物》，《文物》1976年第7期。

⑤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闽侯南屿南朝墓》，《考古》1980年第1期。

⑥ 林国平、彭文宇：《福建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9页。

相较于佛教、道教的兴盛，福建唐宋时期在民间信仰方面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打开方志，很容易发现，至今仍在福建流传的众多的地方神，绝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被塑造出来的，鬼神迷信弥漫着整个社会，《八闽通志》载：“闽俗好巫尚鬼，祠庙寄闾阎山野，在在有之”。^①《宋史》也说：福建“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②经过三国至唐中期的对北方民间信仰的吸收消化，唐末宋元时期的福建造神运动呈现本土化的倾向。一方面，一些从北方传入的民间信仰，进一步与福建的人文、地理相适应，产生了若干变异，逐渐本土化。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福建境内在这个时期涌现的数以千计的神灵中，绝大部分是土生土长；至今仍在福建有较大影响的神灵都是在唐末至两宋时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诸如妈祖、临水夫人、保生大帝、三平祖师、清水祖师、定光古佛等。这方面的材料散见于史书、文集、方志、碑刻等文字材料。而有关动物神崇拜的材料主要还是集中于考古发现的墓葬中的随葬品。

唐宋时期福建的墓葬中随葬了较多的动物明器神煞，是人们动物崇拜的表现。此时，由于地理堪輿术的风行以及道教、佛教的发展，埋葬制度逐渐趋于规范化，反映这种埋葬制度的代表作是金元时代成书的《大汉原陵秘葬经》^③，反映了中原北方地区民间文化中的丧葬制度。据徐苹芳先生结合考古发现的研究表明《秘葬经》中所记的许多葬俗，在山西、河北、陕西、河南、四川等地的唐代至元代的墓葬中还或多或少的保存着。《秘葬经》中的地理风水之说，其渊源是来自唐代的西京（陕西）。以西京为中心，北至山西、河北，南至四川，东至河南，西至甘肃，都受到唐代西京的影响。随着时代的转移，这些地区的葬俗虽然各自起着变化，但仍应有许多共同之处。^④《秘葬经》所载的明器制度，约在唐代中晚期从中原地区开始传入福建，中经五代的传播，至宋代渐臻盛行，并且形成浓厚的地方特色。^⑤中唐至晚唐，年代约在公元八世纪下半叶至九世纪末。福建出土的墓葬中的随葬品变化显著，其中包括新出现的动

①（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五十八，《祠庙》。

②《宋史》卷八十九，《志·地理五·福建路》。

③原书内容载于《永乐大典》卷八一九九，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④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

⑤林忠干：《福建五代至宋代墓葬出土明器神煞考》，《福建文博》，1990年第1期。

物形陶俑，如鸡、鸭、狗等，以及人首龙身的墓龙、人首鱼身的仪鱼等。^①这应该是受到了中原影响所致。

福建五代宋墓发现的明器实物，更多地出现了动物俑，或是与动物崇拜有关的塑像、器物。^②这些宋墓中所反映的动物崇拜，也多是受到了来自中原的明器制度的影响。

墓葬中有四灵神俑，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陶制四灵俑见于五代宋墓，寿山石雕俑见于福州南宋墓。五代青龙为弯身長足形，白虎为卧式本相，朱雀似孔雀开屏状，玄武为龟蛇相交状。南宋石雕青龙为平身仰首状，白虎、玄武似五代形状，朱雀是鸚鸟式。在《秘葬经》中，四灵被称作“四廉路使神”，置于大夫以下至庶人坟墓棺室的四角。古代以四灵代表四方星位。《三辅黄图》：“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③《礼记·曲礼上》：“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④墓葬地券砖契文记冥界四极“东止青龙，西抵白虎，南及朱雀，北距玄武。”置四灵俑于墓室，是一种镇墓行为。

墓龙、仪鱼俑，五代墓陶俑墓，龙是双人首共一身，仪鱼是人首鱼身。南宋墓石俑，墓龙人首蛇身，仪鱼人首鱼身，背部皆负载山岩。《秘葬经》载墓龙置公侯卿相墓，仪鱼天子至庶人墓皆置。

十二时神俑，五代、北宋墓十二时神陶俑，是在人物的头顶部堆塑鼠、牛、虎、兔等生肖形象，亦见于壁画上。南宋以后多堆塑于龙虎瓶的肩颈部。十二时神，《秘葬经》称“十二元辰”，天子至庶人墓皆有。人们所生年的十二属相依次与十二地支搭配，组成子鼠、丑牛、寅虎、卯兔等一系列年份。这种以动物纪年的方法最晚应形成于汉代，王充《论衡·物势篇》载：“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⑤古人对神化的生肖赋予一定的造型，当作随葬品与死者一起掩埋，表明即使进入阴曹地府，也要生肖相随，象征岁月轮回吉祥如意。

金鸡、玉犬俑，见于宋墓陶瓷或石制作本相。《秘葬经》载天子至庶人墓皆有。鸡鸣犬吠，亦是镇守幽宅之职能。

① 林忠干、林存琪、陈子文：《福建六朝隋唐墓葬的分期问题》，《考古》，1992年第2期。

② 林忠干：《福建五代至宋代墓葬出土明器神煞考》，《福建文博》，1990年第1期。

③ 《三辅黄图》卷三，《长乐未央建章北宫甘泉宫中宫室臺殿》。

④ 《礼记》卷一。

⑤ （汉）王充：《论衡》卷三。

铁牛、铁猪，南宋墓葬中盛行，又以铁牛为主。《秘葬经》载天子至庶人墓皆有，铁牛称“金牛”。《大唐新语·记异》说：“墓欲深而狭，深者取其幽，狭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为土界，又一丈二尺为水界，各有龙守之。土龙六年而一暴，水龙十二年而一暴，当其隧者，神道不安，……铸铁为牛豕之状，可以御二龙。”^①

墓中随葬的坛，北宋多带盖宝顶，器身或有堆塑金鸡、玉犬及个体人物的形象。南宋时，多带笠帽式盖顶伏鸟，堆塑内容逐渐增多，如十二时神人物、日、月、龙、虎、四神等。

随葬龙虎瓶，北宋时仅为一龙缠绕肩颈部，南宋以后器身渐修长，堆塑内容层次渐繁杂，如龙、虎、鹤、鹿、仰观、伏听、十二时神人物、日、月等。此类瓶主要见于闽北地区，道教色彩浓厚，与江西所出较为一致。^②宋代江西贵溪县的龙虎山为江南道教中心，闽武夷山冲佑道观也成为中国六大名观之一，这一地区道教的传播之盛是可以想见的，因而很自然地反映到陶瓷明器的装饰方面。龙虎瓶的作用，除了宗教意义外，在民间还可能具有祈祷风调雨顺的具体兆象。《闽杂记》引唐刘禹锡《嘉话录》：“以虎头置龙潭中，威猛相击，其势必斗，则可以致风雨，或遇水旱，为之有验。”清代福州传说：“以虎头整骨投南台江，即志言越王余善钓白龙处，至今犹传为龙宅也。寅日辰时所投，未刻果大雨，人咸异之，时称为龙虎斗。”^③

第三节 明清以来福建民间动物神灵崇拜

明清时期，东南社会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福建的民间信仰也进入了兴盛阶段。此时的福建动物神灵从陆生动物到水生动物，从飞禽到爬行走兽，是一个多样而复杂的民间信仰体系，同时也折射出了福建民间文化的丰富多彩。（福建人的蛇、蛙、鸟、狗等动物崇拜将放到下两章讨论。）

①（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十三。

② 陈定荣：《论堆塑瓶》，《中国古陶瓷研究》创刊号，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③（清）施鸿保：《闽杂记》卷一，《龙虎斗》。

一、昆虫类

金蚕神，以蛊毒人，是古代南方最神秘的一种凶巫术，从事蛊毒者，都要敬奉金蚕神。金蚕神专以害人为目的，一部分人祭祀金蚕神是为了谋财害命。福建古代多有人家蓄蛊，关于其如何以蛊害人，古人有一段记载：蓄蛊者“于每年端午，探取百毒虫，封贮瓦罐，自相残食，逾年起视，独存一虫，形如蚕色，用金三、四片、茶叶、枫香养之。择日占断，一年当用几次，依占取出虫粪，秘置饮食中，使人腹痛，死后魂魄为之力作，坐是致富，翁婿递相承受。逢朔望日，夫妇赤身拜祝云：‘金蚕公，金蚕娘，我家夫妇没衣裳’等语。……”^①除了金蚕蛊之外，传说福州还有其他种类的蛊，《闽海蛊毒记》记载：“福建诸州大抵皆有蛊毒，而福之古田、长溪为最。其种有四：一曰蛇蛊，二曰金蚕蛊，三曰蜈蚣蛊，四曰蝎蝎蛊，皆能变化，隐见不常。”^②

蝴蝶，惠东女出嫁时必须绞面、“上头”、梳蝴蝶髻、穿黑衣服。出嫁之晨，头巾要裁成蝴蝶状。婚后每逢年兜七月、奉祀祭祖都必须梳“簸箕髻”蝴蝶状发式。这里有个传说，传说惠安城内南岭桥下的蝴蝶洞里住了群蝴蝶精。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泉潮间蛮獠啸乱，为靖边，派陈政父子入闽，出镇绥安（漳浦）。从史书看，陈政父子平蛮獠啸乱曾经过惠安，而处于母系氏族的蝴蝶峒民被陈政父子平后，遗民四处逃窜，以海陬山崖为新聚居地，因此，惠东居民就是以蝴蝶为族徽的峒民。又相传明朝嘉靖年间小岞人武士李蝴蝶，在泉州少林寺练拳，后凭高强武艺大败侵扰家乡的倭寇。后人建祠纪念这恩人，因此惠东人也就崇拜蝴蝶了。^③

二、爬行动物

龟，对龟的崇拜可以上溯至遥远的上古年代，黄帝族、鲧氏族及东夷的一些氏族，都曾以龟为图腾，甚至以其形象作为族徽。其后，龟崇拜之风一直盛行。元明之际，对龟的崇拜一落千丈，逐步跌入低谷。^④而福建至今崇龟习俗

① 乾隆《汀州府志》卷四十五，《丛谈》。

② （宋）杨黼：《闽海蛊毒记》，《五朝小说大观·宋人小说·传奇家》。

③ 陈国华：《百越遗风》，陈国强主编：《惠安民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④ 程自信：《论中国龟崇拜的历史演变》，《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1期。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